

语体机制与词汇替换

——基于近代汉语“牲畜”义词演变的考察

王文香

(杭州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, 杭州 311121)

摘要: 近代汉语阶段“牲畜”这一概念的表述发生了两次词汇替换: 汉语史早期常用的“畜”类词在元代被“头匹”“头口”合力取代; 至迟到18世纪中期以后, “牲口”替换了“头口”, 并一直沿用至今。“牲口”很可能源自江淮地区, “牲畜”义词的替换是基于语言内外两个动因: 语体缺位, 语言内部语体机制调节的需要及江淮官话词语对通语的渗透。

关键词: 语体; 词汇演变; “牲畜”义词; 元明易代; 江淮官话

中图分类号: H03

文献标识码: A

文章编号: 1000-1263(2024)04-0046-08

汪维辉(2015)归纳了基本词新旧更替的动因, 指出“探求基本词新旧更替的动因应该更多地从外部因素着眼。外部因素主要有两个: 一是通语和强势方言的影响, 二是语言接触。此外还有避讳等人为因素”。近年来, 随着语体语法研究的发展, 越来越多语言现象的演变被证明与语体因素密切相关。冯胜利(2014)指出, “语体系统是一个变动不居、时时调整的运动体系。因此, ‘语体缺位’不仅是不可避免的, 实际是该系统的本质属性”, 认为“‘语体缺位’是新词产生的重要原动力! 而语体缺位的必然性, 又帮助我们发现了语言演变与社会演变两种不同的动源”。本文以近代汉语“牲畜”义词的演变为例, 追溯“头口”“头匹”“牲口”等词语的产生和发展, 考察“牲畜”义词在唐以降, 尤其是元明清时期的演变及其动因, 揭示语体在词汇演变中所起的重要作用。

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耕大国。作为农耕民族, 汉民族历史上也曾多次与游牧民族相互征战、交流与融合, 牲畜在战争、农耕以及交通等活动中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表示“泛指牲畜”这一概念, 汉语史早期多说“畜”“畜牲/生”“畜产”等(以下称“畜”类词), 近代汉语阶段是这一概念表述的大变革时期, 其间经历了两次词汇替换: 唐以后“头匹”“头口”分别出现, 它们在元代对“畜”类词形成夹击之势, 合力取代了“畜”类词的主导地位; 但发展到明代, 二者已是强弩之末, 至迟到18世纪中期, 明代新兴词“牲口”取而代之, 并一直沿用至今。

一 唐宋时期

名词“头匹”“头口”都产生于近代汉语阶段。“头”“匹”“口”本是称量不同牲畜的量词, 它们组合构成复合量词“头匹”“头口”, 用以称量两种及以上的牲畜, 这是唐以后才产生的新用法。“头匹”

基金项目: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专项规划课题“域外文献视角下明清汉语通语词汇的形成研究”(24ZJQN021YB);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暨优秀博士论文出版项目“江淮起源型词的历史与语体研究”(21FYB054); 杭州师范大学科研启动经费项目“明清基础方言转移与词汇替换: 基于几组个案的研究”(RWSK20200418)

作者简介: 王文香, 女, 1989年生, 山东泰安人, 博士, 讲师, 研究方向为汉语词汇史和训诂学。

“头口”用法发生转指，可用作表“牲畜”义的名词^①。

1. 头匹。《世说新语·雅量》“谢公与人围棋”条，刘孝标注引《谢车骑传》：“射伤坚，俘获数万计，……牛、马、驴、骡、驼十万头匹。”前人在论及“头”“匹”连用的早期用例时，多以此例为证，以为是“南北朝人的创造”，如刘世儒（1959，1965：30）、吴非（1990）、陈秀兰（2002：209）等。但应该注意的是，该例存在异文，影宋本及沈宝砚校本《世说新语》均无“匹”字，故此例恐未可信凭。比较可靠的用例要到唐五代时期，唐樊绰《蛮书·名类第四》：“自大中八年，经略使苛暴，令人将盐往林西原博牛马，每一头匹只许盐一斗。因此隔绝，不将牛马来。”此外，量词“头匹”在《张议潮变文》中有2处用例，《旧唐书》中4见。量词“头匹”用法转指，作表“牲畜”义的名词，如：

- 1) 遂便散却手下徒党，只留三、五人，作一商客，将三五个头匹，将诸行货，直向东都，来卖远公，向口马行头来卖。（《敦煌变文校注·庐山远公话》）
- 2) 特于元定赏军物内，减金万铤、银一十万铤、表里一十万段，以充振乏广施之用。外有喝下金帛头匹，更望止于今岁，逐月接续交还。（《三朝北盟会编》卷36《靖康中帙·翰离不上书辞别》）^②

《三朝北盟会编》中“头匹”共3见，另有2例作量词。宋代“头匹”用例以量词用法为主，例不备举，而名词“头匹”还很少见到。

2. 头口。“头口”连言的用例也见于唐代文献，唐陈子昂《上西蕃边州安危事》：“今安北府见有官羊及牛六千头口，兵粮粟麦万有余硕。”元代以前“头口”用例也不多见，但以名词用法为主，少数作量词，如：

- 3) （张藏英）以本军兵士及职员户人、孳畜七千头口归化。（《旧五代史》卷113《周书·太祖纪第四》）
- 4) 生获正副首领二人、马一百匹、骆驼三十头、牛羊约三十余头口，烧荡了族帐千余帐。（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471《哲宗·元祐七年》）

“头口”用作名词^③，如：

- 5) 丁巳，云州奏：掩袭契丹，获头口万计。（《旧五代史》卷41《唐书·明宗纪第七》）
- 6) 道路险阨，不通车乘，惟是头口驮载，人夫担负。（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520《哲宗·元符三年》）
- 7) 夫弓箭手、民兵，五路之根本也。每差戍守，一月一易，则必入市头口，负千粮、器械所需之物而趋焉。（赵汝愚《诸臣奏议》卷45《（王襄）上钦宗论彗星》）
- 8) 若有前项人等并家属，用铺头口^④起移赴东平府地分住坐。（孔元措《孔氏祖庭广记》卷五）

我们调查了唐宋时期几部文献中“牲畜”义词的使用情况，见下表：

唐宋时期“牲畜”义词使用情况

表1

	敦煌变文校注	祖堂集	新唐书	夷坚志	三朝北盟会编	续资治通鉴长编	总计
头匹	1				1		2
头口						17	17
孳畜					2	52	54
畜生	8	11		3			22
畜产			9	3	3	20	35
畜类	3			7			10

表达“牲畜”的概念，唐宋时期仍以“畜”类词为主，常用的有“孳畜”“畜产”“畜生”等。此外，

① 这种转指的机制究竟是基于动物身体部位的指代，还是源自以量词指称名词，尚需进一步讨论。就“头口”而言，看似两说皆通，但就“头匹”来看，似乎后者的可能性更大。

② 该事例又见《大金吊伐录》卷上《上书（兵回，差使副代辞）》及《金文最》卷51《班师辞别宋钦宗书》（天会四年），“喝”分别记作“歇”“赐”。按：作“喝”不误，“喝”在句中为“赏赐”义。详见王文香（2020）。

③ 名词“头口”另有“丁口，人口”义，岳珂《金佞粹编》卷17《赴镇画一申省札子》：“本军头口，老小、正兵七万余人口，飞差人前去体探得通、泰二州即日并无粮斛，况粮斛猝急难以擘画。”

④ 《汉语大词典》“铺头口”条：“犹铺马，驿马。”

也说“畜乘”“畜剩”等词，但用例不多。（参看张小艳 2006）直到南宋李焘的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^①中，“头口”才出现较集中地分布，但用例尚不及“畜”类词使用频繁。

二 元代

元代蒙古族入主中原，鉴于游牧民族自身对牲畜的重视，再加上统治者努力协调农业与畜牧业的关系，在元朝颁行诸多法令文书中，多有关涉到牲畜的条文。元代开始，表“牲畜”义的主导词发生了变化，以“头匹”“头口”为主。酌举几例：

- 9) 不以是何诸色人等，毋得纵放头匹，食践损坏桑果田禾。（《元典章·圣政一·劝农桑》）
- 10) 太祖成吉思皇帝圣旨里，教头口吃了田禾的每，教踏践了田禾的每，专一禁治断罪过有来。（《通制条格》卷16《田令》）
- 11) 大都等路，诸买卖人口、头匹、房屋一切物货交易，其官私牙人，侥幸图利，不令买主、卖主相见。（《至正条格》卷28《关市·牙行欺弊》）
- 12) 你这几个头口，每夜吃的草料通该多少钞？这六个马每一个五升料、草一束，通算过来，盘缠著五两钞。（《原本老乞大》）

王文香（2018）考察了元代几部“同时资料”中“牲畜”义词的使用情况，转引如下：

元代“牲畜”义词使用情况

表2

书名	农桑辑要	元典章	通制条格	新集至治条例	至正条格	原本老乞大	总计
成书时间	1273	约 1260-1320	1297-1320	约 1322	1345	约 1346 前	
头口		39	8	3	8	9	67
头匹		66	48	11	57	2	184
畜产	1	1					2
孳畜	2	7				1	10
畜生							0

元代“同时资料”《元刊杂剧三十种》中无“牲畜”义词用例，而在所调查的元代四种法令文书中，“头匹”的用例占绝对优势，其次是“头口”。《原本老乞大》表现出与法令文书不同的用词特点，主要用“头口”（9 见），“头匹”仅 2 例。此外，《元典章》中虽出现 2 例“畜生”，但皆用作詈语，如《吏部》卷四《职制·不赴任官员》：“那般要罪过者，交那畜生每种田者。”故此处未统计入内。

“头匹”和“头口”都是既可作复合量词，又可作名词。早期“头口”的使用范围相对较广，但倘若并提的牲畜中包括马等须以量词“匹”称量的牲畜，则一般用“头匹”。崔世珍《朴通事集览》云：“头口，泛指马牛猪羊之称。数猪以头，数牛亦曰头，数羊以口，数獐亦曰口，故泛称畜口曰‘头口’，牛马亦曰‘头匹’。”但发展到元代，这一差别似乎在逐渐消失。如《元代白话碑集录·彰德上清正一宫圣旨碑》：“铺头口祇应休要者。地税商税休与者。”蔡美彪注：“此语一般碑中译作‘铺马祇应’，此处译‘马’为‘头口’。”如例 12）亦用“头口”指称“马”。

这一阶段词汇替换的原因主要是语言内部因素：随着“畜”类词的过度使用，促使它们向俚俗语乃至詈语转化，如《元典章·吏部·广选不赴任例》：“那般者有罪过者，那畜生每根底，也交种田者。”“畜生”正是用作詈语。这正符合 Schousboe（2010：177-179）所总结的语义定律，“指称家禽、家畜及其相关概念的词语，若内涵义发生改变且外延意义随之改变而用于人类，则变成贬义而非褒义”（吴福祥 2017）。“畜”类词詈语化，则指称“牲畜”义的词语就出现缺位现象，“头匹”与“头口”便合力取代了“畜”类词，成为元代表“牲畜”义的基本词，这大致反映了元代北方地区“牲畜”义词的使用情况。

^① 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帙浩繁，失于传写，传本极少，现存本为四库馆臣从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出编纂而成，至于在何种程度上保存了原貌，我们还不得而知。综合考虑宋元时期的用例情况，我们认为其用例基本上是可信的。

三 明清时期

1. 明清时期“牲畜”义的使用情况。“牲口”在明初即已产生，但也仅在江淮地区的部分文献中集中出现。明清小说中，“畜”仍然主要作为语素保留在合成词中，如“业畜”“孽畜”“牛畜”等，而“畜生/牲”则更多地用作詈语。表“牲畜”义的常用词“头匹”“头口”与“牲口”构成竞争替换关系。我们调查了“牲畜”义词在明清文献中的使用情况，见下表：

明清文献中“牲畜”义词的使用情况

表 3

时代	文献	头匹	头畜	头口 ^①	牲口 ^②	牲畜
明	《大诰》系列	1			6	
	元朝秘史	1	1	5		
	皇明诏令	1	3		13	
	水浒传			12	6	
	西游记				1	1
	金瓶梅词话			60	3	
清	醒世姻缘传		1	89	7	
	聊斋俚曲集				11	
	红楼梦				5	
	儒林外史				7	
	歧路灯			13	37	
	儿女英雄传			5	65	
	官场现形记				6	

调查显示，元代常用的“头匹”在明代迅速退出了词汇系统，仅在《大诰》《元朝秘史》和《皇明诏令》中分别出现 1 例。而“头口”则作为底层方言词保留在北方话文献中，《元朝秘史》为明初所译汉文本，由蒙古语转写而来的汉字音“阿都温”被译作“头口”“马群”，而不使用《大诰》系列中常用的“牲口”，《金瓶梅词话》中“头口”用例较多（60 见），其次是《水浒传》（12 见），尤其到带有山东方言色彩的文献《醒世姻缘传》^③中，“头口”更是高频出现（89 例）。

明清时期，“头口”成为北方话的底层方言词。明代沈榜《宛署杂记·民风二·方言》记载了明代万历年间的北京方言，“驴骡曰头口”。又，明代徐昌祚《燕山丛录》卷 22《长安里语·鸟兽》：“驴骡曰头口，又曰生口。”《燕山丛录》对《宛署杂记》多有因袭，新增“又曰生口”句，很可能反映了“生口”传入北京的时间。明人沈德符《万历野获编》卷 24《小唱》记载了一则趣闻，“近日，又有临清、汴城以至真定、保定儿童，无聊赖，亦承乏充歌儿，然必伪称浙人。一日，遇一北童，问汝生何方？应声曰浙之慈溪。又问汝为慈溪府慈溪州乎？又对曰慈溪州。再问汝曾渡钱塘江乎？曰必经之途。又问用何物以过来？则曰骑头口过来。盖习闻侪辈浙东语，而未曾亲到，遂堕一时笑海。”又，清人王士禛笔记小说集《池北偶谈》卷二十《谈异一·善谑》记载明代山东莱阳人宋琬善谑，“京师有市猾某者，本驢马行牙人，以附黄膘李至巨富。一日堂成，宴士大夫，壁间有孔窠，客疑，问之，答曰：‘手脚眼也。’盖工匠登降攀附置手足处。宋荔裳在坐，应声曰：‘吾有对句矣，乃头口牙也。’合坐大笑。”可见，“头口”在明代是通行于北京、山东等广大北方地区的口语词。

“牲口”在明初出现，早期仅在带有江淮方言色彩的文献中用例较多，清代以降才逐渐行用开来。

① 金陵世德堂本《西游记》第 73 回：“沙僧道：‘说得是，一则进去看看景致，二来也当撒货头口，看方便处安排些斋饭与师父吃。’”后文第 78 回写作“撒和马匹”。且明书林杨闽斋刊本《西游记》无此句，故暂不列入。《儒林外史》第 25 回：“次日，邵管家上街去买东西，买了四、五天，雇头口先过江去了。”此例“头口”有异文，申一本作“雇牲口”，申二本作“雇了船”，亦不列入。

② 金陵世德堂本及明书林杨闽斋刊本《西游记》与大连图书馆藏辛丑十行本及同德堂刊本《醒世姻缘传》皆记作“生口”，我们认为是“牲口”在明清时期的异体写法。

③ 关于《醒世姻缘传》的成书时代及作者，学界一直聚讼纷纭，至今尚无一致意见。就时代而言，历来有“崇祯说”“顺治说”“康熙说”等说法。我们赞同杨东方（2008）的看法，“鉴于材料的缺乏，现在断定《醒世姻缘传》的具体成书时代还为时过早，我们只能笼统地说其为明末清初作品，这是最妥当，也是最应该的态度”。

《醒世姻缘传》仍然使用带有北方方言色彩的“头口”（89例），“生口”仅出现7例，而《聊斋俚曲集》则一律采用已进入通语的“牲口”（11例），未见“头口”用例。两部文献方言背景相同，却反映出截然不同的用词倾向，成书时代略早的《醒世姻缘传》大概是沿袭了《金瓶梅词话》时代的用词特点。而自《聊斋俚曲集》以降，“牲口”在北京话文献《红楼梦》《儿女英雄传》和带有江淮方言色彩的《儒林外史》以及河南方言色彩的《歧路灯》直到清末的《官场现形记》等文献中，都占据主导地位，成为表“牲畜”义的主导词。

域外汉籍文献也反映出与此相同的用词倾向，可以更加清晰地显示出“牲畜”义词在元以后的兴替情况，下面我们考察了几种主要域外汉籍中“牲畜”义词的使用情况。

域外汉籍文献中“牲畜”义词使用情况

表4

时代	文献	畜产	头口	头匹	头畜	牲口	牲畜
元	原本老乞大（约1346前）		9	2			
明	高丽史（1451）		1	5			
	训世评话（1473）	1	1				
	老乞大谚解（约1483）		10	1			
	朴通事谚解（约1483）		4				
	吏文·吏文辑览（1539）			2	5	1	
清	老乞大新释（1761）					11	
	朴通事新释谚解（1765）		1			2	
	重刊老乞大（1795）					11	
	官话指南（1882）					4	
	华音启蒙谚解（1883）					3	

夏凤梅（2005）基于《老乞大》四种版本，初步讨论了“头口-头匹-牲口”的使用情况，我们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考察。表达“牲畜”的概念，《原本老乞大》和《老乞大谚解》主要用“头口”，分别出现9例和10例；此外，两书中也出现少量“头匹”用例，此后“头匹”便少见于文献。成书时间与《老乞大谚解》和《朴通事谚解》相近的《训世评话》也还是只用“头口”（1见）而无“牲口”。到《老乞大新释》和《重刊老乞大》时代，“头口”已被悉数换作“牲口”，均11见。可见，至迟到18世纪中期，汉语口语教科书中的“牲口”已取代了“头口”，成为表“牲畜”义的主导词^①。

综上，明清小说文献及域外汉籍文献所反映的情况基本一致，至迟到18世纪中期，“牲口”取代了“头口”，成为汉语中表示“牲畜”义的主导词，并沿用至今。

2. “牲口”的产生及可能来源。“牲口”较早地出现在明初朱元璋亲自编纂和颁布的《大诰续编》及《大诰三编》中，凡6见，如：“差人诣所在捉拿，本人已于本处娶讫妻室，盖造院宅，置买牲口，就彼为家。”（《大诰续编·力士催砖第八十一》）又，“凡大驾、东宫、王驾出入并诸将征进，有所祭祀，牲口并属本部收买。”（《大诰三编·王锡等奸弊第二十九》）

上述系列诰文应该是朱元璋参与编纂或据其口述记录而成的，《明太祖实录》卷176记载了朱元璋颁行《初编》时对臣下讲的一段话：“万机之暇，著为《大诰》，以昭示天下。”刘三吾在《大诰后序》中也说：“（上）不忍弃绝之，载劳圣虑，条画成书，颁示中外臣民，家传人诵……题曰《大诰》。臣三吾窃惟皇上图治，不遑暇食，犹乃营缮是书，以为世戒，其爱民之意深矣。”^②说明朱元璋确实参与了诰文的制订。鉴于文献不足，我们已无从考定“牲口”一词是否出自朱元璋之口，但大概可以肯定的是，他对这一词语应该是相当熟悉的。朱元璋是“濠之钟离东乡人”（今安徽凤阳），其参与编纂的诰文，应

① 据张美兰、刘曼（2013：423），满汉合璧文献《清文指要》所反映的情况与清代《老乞大》的两个改写本所显示的用词现象是一致的，也是只用“牲口”，不再说“头口”。

② 需要注意的是，作为正式颁布全国的诰令，上述诰文的语言可能经过了儒臣润色，表现出鲜明的书面色彩。另有一例需要说明，明人王世贞《弇山堂别集》卷87《诏令杂考》收录了一则洪武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诏令：“云南既定，梁王自死，家小都被俺收了。那各处土官不晓事，叛甚么？若晓事，不作歹呵，将那大军踏践坏的人口头匹纳差发呵，几年用得了？那厮每许大地方，如何无一个晓事的把事，都这般不知天道人事，可惜搅坏了。你部家即便出榜去教土官、百姓知道，教听者俺的言语，安分守己当差，休做歹。不听话呵，俺再用心，他每当不得。”上揭诏文用词鄙俚，文不雅驯，倘若真实可靠，很可能是朱元璋的口语实录。我们认为，朱元璋口中“头匹”用例很可能是受到了“汉儿言语”的影响。

该使用了当时江淮地区的口语词，“牲口”很可能就是其中一例。

现代汉语方言的“牲畜”义词的分布为这一看法提供了佐证，根据《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》，“牲畜”义词的使用分布情况如下：

现代汉语方言中“牲畜”义词的分布情况^①

表 5

	东北			江淮				西南				冀鲁		胶辽		中原				兰银		晋语		徽语		湘语	
	哈市	南京	扬州	武汉	贵阳	成都	柳州	济南	牟平	洛阳	徐州	万荣	西安	西宁	银川	乌市	太原	忻州	绩溪	长沙	娄底						
牲口	+	+	+	+	+	-	+	+	+	+	-	+	+	+	+	+	-	+	+	-	+	+	-	+	+	-	
头口/牯/骨	-	-	-	-	-	-	+	+	+	+	-	+	+	-	+	-	+	+	-	-	-	-	-	-	-	-	
畜生/牲	-	+	+	-	-	+	-	+	-	-	-	+	+	-	-	-	-	-	-	+	-	-	+	-	-	+	
	赣语			闽语				客家话		粤语		平话		吴语													
	南昌	黎川	萍乡	厦门	福州	建瓯	梅县	于都	广州	东莞	南宁	上海	崇明	苏州	丹阳	杭州	宁波	温州	金华								
牲口	-	-	+	-	-	-	-	-	-	+	-	-	-	-	-	-	-	-	-	-	-	-	-	-	-	+	
畜生/牲	+	+	+	-	-	-	-	+	+	-	-	-	-	-	-	-	-	-	+	-	-	-	+	-	-	+	
头牲/生	-	-	+	+	+	+	+	+	-	-	+	-	-	-	-	-	-	-	-	-	-	-	-	-	-	-	
众/中牲/生	-	-	-	-	+	-	-	-	-	-	-	-	+	+	+	+	-	+	-	-	-	-	-	-	-	-	

从共时分布来看，吴语区主要说“众/中牲”，闽语区则主要用“头牲”，这些地区都不太可能是“牲口”的源生地。北方官话区“牲口”与“头口/骨/牯”类并行，但历史上“头口/骨/牯”类才是底层用法。江淮地区是“牲口”分布较密集的地区，从逻辑上看，现代方言中分布集中的区域，应该就是词语最初的发源地。（参看汪维辉等 2010）“牲口”的早期用例的地域与现代汉语方言分布存在明显的对应关系，这表明江淮地区很可能就是“牲口”一词的源生地。

四 “牲口”替换“头口”的动因

“牲口”一词替换“头口”，并非出于偶然，可以从语言内部和外部两个因素来解释，以下试作说明。

1. 内部因素：语体缺位，语言内部语体机制调节的需要。“牲口”最初出现在明初《大诰》系列诰文中，与“头口”“头匹”等北方话底层成分相比，它甫一出现便显示出浓重的书面色彩。大概通行于北方地区的“头匹”“头口”太过鄙俗，难登大雅之堂，所以在正式颁发的《大诰》系列这类高文典册中，采用了源自江淮地区的“牲口”，明朝迁都后，伴随着南京官话地位的提升，“牲口”一词凭借其在书面语中的优势地位，屡屡见诸文人口头笔端，并迅速流行开来，就连带有山东方言特色的《聊斋俚曲集》也放弃“头口”，一律使用“牲口”（11例）。此后，“牲口”便取代“头口/头匹”，成为表示“牲畜”义的基本词。“牲口”作为与“头匹”“头口”相对的书面语词，进入词汇系统继而传播扩散，这是“牲口”替换“头口”的一个重要因素。郭锐等（2017）指出，南北官话来源的词汇的语体色彩存在差异，来自南京官话的词汇更加正式，书面语色彩浓厚，而来自北京官话的词汇则更加通俗，口语色彩浓重，如北京官话说“耗子”“胡同”“自个儿”，而南京官话则倾向于使用更加书面的“老鼠”“巷”“自己”等。我们认为“牲口”的扩散也是如此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元末明初还出现了“畜生/牲”的同素逆序词“牲畜”。它与“牲口”在语体色彩上形成了新的对立。“牲口”为“牲畜的俗称”（《汉语大词典》），而“牲畜”是目前指称这一概念的正式说法。《现代汉语用法词典》辨析了“牲畜”与“牲口”：“①词义范围不同。‘牲畜’指人驯养的家畜，范围大一些；‘牲口’仅指人驯养来帮助干活的家畜，如牛、马、骡、驴、骆驼等，不包括猪、猫、羊等。②语法特点有不同。‘牲畜’一般不受表示确切数量的数量值组的修饰，只受‘一些’‘一批’‘一部分’‘几种’等修饰；‘牲口’可以受表示确切数量的数量值组修饰，如‘三头牲口’‘五匹大牲口’等。”“牲畜”是总称、泛称，“牲口”的语义更具体、时空性较强。

二者的语体属性还可以根据重音分布来分辨，“牲口”读音为“shēng · kou”（《现代汉语词典》），为非正式体的口语形式，而“牲畜”则没有轻声形式。这正符合冯胜利（2006）指出的双音节词语在表

① 因表格限制，官话方言区名称均省略“官话”二字，哈尔滨、乌鲁木齐分别简称“哈市”“乌市”。广州、雷州方言词典未收录相关词语。另，海口说“畜物”；金华也说“牲徒”，银川和忻州也说“牲灵”，牟平也说“畜类儿”，南宁和丹阳也说“牲畜”。

达正式与非正式的区别上的规律，“一般说来，凡是带有（或趋向于）轻声的是口语的形式；凡是表达正式语体色彩的都没有轻声或不能轻读”。“牲口”一词语体色彩的改变说明语体范畴的对立面是相对的，词语的语体属性随时代的变化而改变，故而在明清时期以降的通俗文学作品中，多用“牲口”一词。从“头口”“牲口”“牲畜”等词语的产生与演变看，“正式与非正式是相对的，是根据‘时（时代）、地（社会）’的不同而不同的”。（冯胜利 2014）语体系统中的“语体缺位”现象也是词汇演变的重要推动力。

2. 外部因素：江淮官话词语对通语的渗透。汪维辉（2016）指出：“元明之交是个转折点。元明易代导致汉语发展转向，南系官话地位上升，并持续影响了北京话。”“明朝立国后，江淮官话成为权威方言，它的影响并非仅限于建都南京的五十几年，而是贯穿整个明朝，而且一直延续到清朝后期。……明清以来北系官话吸收了南系官话的大量方言词，成为今天民族共同语的基本词汇。”我们认为，“牲口”很可能就是其中一例。

“牲口”大概是随着明朝迁都而由江淮方言传入北京的。朱元璋奉行“治乱世用重典”的政策，故颁行《大诰》以教化臣民、惩创奸顽。颁行《大诰》时，他使用强制手段在全国大力推行，他宣称“朕出是诰，昭示祸福，一切官民诸色人等，户户有此一本。若犯笞杖徒流罪名，每减一等；无者每加一等。所在臣民，熟观为戒。”（《大诰·颁行大诰第七十四》）次年颁布《大诰续编》时，他又指出：“朕出斯令，一曰《大诰》，一曰《续编》。斯上下之本，臣民之至宝，发布天下，务必户户有之。敢有不敬而不收者，非吾治化之民，迁居化外，永不令归，的不虚示。”（《大诰续编·颁行续诰第八十七》）朱元璋后来命令“颁《大诰》于国子生及各儒学”，并“令民间子弟于农隙之时讲读之”，洪武二十四年三月，还特命礼部云：“《大诰》颁行已久，今后科举岁贡人员，具出题试之。”

由此，《大诰》得以“家传人诵”，诰文中的词语也习用开来，表现在“牲口”一出现就在几部江淮地区的文献中占有优势。此外，明清时期的几次大规模移民潮，可能也是“牲口”扩散传播的另一个助力因素。正如甲柏连孜（2015：7）所言：“来自方言宝库的新词语会渗入文学语言，能证明这一点的是，在有些时期的书上会突然冒出一些新鲜的词语。特别是帝都的口语，以及有时候皇家使用的方言，在这方面贡献很大，因为我们知道，皇室和朝代在不断更替。”

“普通话中究竟有多少词语是来自南系官话还需要系统深入的研究，这是一个大课题，对阐明现代汉语民族共同语的形成过程具有重要意义。”（汪维辉 2016）鉴于文献不足，本文关于“牲口”来源的考证只是一个初步的假设，尚需进一步求证。

参考文献：

- 陈秀兰 2002 《敦煌变文词汇研究》，四川民族出版社。
- 冯胜利 2006 论汉语书面正式语体的特征与教学，《世界汉语教学》第4期。
- 冯胜利 2010 论语体的机制及其语法属性，《中国语文》第5期。
- 冯胜利 2014 语体俗、正、典三分的历史见证：风、雅、颂，《语文研究》第2期。
- 郭锐、翟赟、徐菁菁 2017 普通话从哪里来——从晚清民国时期南北官话的差异看普通话的词汇、语法来源，《中国言语文化学》第6号。
- 刘世儒 1959 论魏晋南北朝的量词，《中国语文》第11期。
- 刘世儒 1965 《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》，中华书局。
- 汪维辉 2005 《老乞大》诸版本所反映的基本词历时更替，《中国语文》第6期。
- 汪维辉 2014 说“日”“月”，《中国语言学报》第16期。
- 汪维辉 2015 关于基本词汇的稳固性及其演变原因的几点思考，《厦门中文学报》第二辑。
- 汪维辉 2016 元明易代与现代汉语民族共同语的形成，见连谊慧《“汉民族共同语”多人谈》，《语言战略研究》第4期。
- 汪维辉、秋谷裕幸 2010 汉语“站立”义词的现状与历史，《中国语文》第4期。
- 王文香 2018 “牲口”的始见年代和书证问题，《中国语文》第3期。
- 王文香 2020 宋代文献中“喝”的特殊用法及其来源，《中国语文》第3期。
- 吴非 1990 头匹，《天津师范大学学报》（社会科学版）第6期。

- 吴福祥 2017 试谈语义演变的规律,《古汉语研究》第1期。
夏凤梅 2005 《〈老乞大〉四种版本词汇比较研究》,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。
杨东方 2008 也谈《醒世姻缘传》的成书年代——与夏薇女士商榷,《蒲松龄研究》第2期。
杨一凡 1988 《明〈大诰〉研究》,江苏人民出版社。
张美兰、刘曼 2013 《〈清文指要〉汇校与语言研究》,上海教育出版社。
张小艳 2006 敦煌社会经济文书语词辑考,《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》第1辑,复旦大学出版社。
[德]甲柏连孜 2015 《汉文经纬》,姚小平译,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。

The Mechanism of Register and Lexical Substitution —Based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Meaning of *Shengchu*(牲畜) in Modern Chinese

WANG Wen-xiang

(School of Humanities,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, Hangzhou Zhejiang 311121, China)

Abstract: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evolution of the meaning of *Shengchu*(牲畜) in Modern Chinese, during which two substitutions occurred: the commonly used *Chu*(畜) in early Chinese were replaced by *Toupi*(头匹) and *Toukou*(头口) in the Yuan(元) Dynasty and the word *Shengkou*(牲口) replaced *Toukou*(头口) no later than the mid-18th century and remains in use today. The word *Shengkou*(牲口) is believed to have originated from Jianghuai(江淮) area. The substitution of the synonymous words for *Shengchu*(牲畜) is driven by both language-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, including the need for register adjustment and the influence of Jianghuai(江淮) Mandarin on common language.

Key words: Register; Lexical Substitution; *Shengchu*(牲畜); Yuan(元)-Ming(明) succession; Jianghuai(江淮) Mandarin

“第四届汉语音义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”成功召开

2024年9月21日至22日,“第四届汉语音义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”在湖北师范大学召开。本次会议由湖北师范大学、华中科技大学联合主办,湖北师范大学文学院、语言学研究中心及古籍研究所联合承办,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“中、日、韩汉语音义文献集成与汉语音义学研究”(19ZDA318)课题组协办。

来自安徽大学、北京大学、复旦大学、杭州师范大学、湖北师范大学、华东师范大学、华中科技大学、南京大学、陕西师范大学、首都师范大学、四川大学、四川外国语大学、苏州大学、武汉大学、西南大学、中国人民大学、中华书局、中南民族大学、中山大学、关西学院大学(日本)、南山大学(日本)等国内外46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中、日、韩、越籍8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。

本次会议以“汉语音义学学科建设:理论·方法·实践”为主题。学者们围绕汉语音义学研究的理论建设、方法创新等话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,同时从音义学与音韵学、训诂学、文字学、语法学、数字人文等的交叉视角对音义个案进行了深入的分析。此次会议对推动汉语音义学学科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。

会议决定第五届汉语音义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将于2025年在上海举行。

(武迎晗)